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经济学家茶座

总第二十辑



- ◆ 刘国光 是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时候了
- ◆ 夏业良 经济学界资源配置的扭曲
- ◆ 党国英 不要妖魔化主流经济学
- ◆ 陈争平 马克思思想的另一半
- ◆ 顾海兵 北京黑车之白
- ◆ 陈 抗 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
- ◆ 董国政 因战争而受益的十类人
- ◆ 徐昌生 婚恋需要经济学
- ◆ 梁小民 走西口与晋商(二)

2005 · 2

山东人民出版社



王松奇，1952年生。分别于1982、1985、1988年在吉林财院、天津财院、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留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1995年，1996年1月调入中国社科院。早年时喜欢文史哲，近20多年来以宏观经济理论、货币金融政策及改革经济学为主要研究内容。检视囊中，各式出版物十余种长短文章数百篇，均乏善可陈；每日省身，自以为博古通今经纶满腹定位却在布衣书生江湖散人，终无甚大用。天命方知，生死玄关已过；四海承平，随波逐流足矣。

在《经济学家茶座》第20辑出版之际，我谨向编者表示祝贺。《茶座》以经济学人的“小品相声”定位，但实际上已在广泛的市场认同中办成了彰显华人经济学家文化厚度的思想沙龙。很多年以前，一位台湾学者在回顾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群星灿烂的景象时曾惊叹：“天才为什么总是成群结队而来！”现在，反思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现状，我们千万不要让人产生这样的担心：中国的文人会不会卷入“集体平庸”？思想上的“集体平庸”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当然，我本人的平庸倾向肯定最严重），但愿《经济学家茶座》能在降低这种“系统性风险”方面多贡献些力量。

王松奇



过河图 (黎青)



志庆·创新·希冀

●金明善

《经济学家茶座》已经开办了5年,出版了20辑。5年来,承蒙作者、读者和编者的持续关心和努力,茶香依然,顾客盈门,令编者和出版者深受鼓舞。

《茶座》开办之初,以轻松、休闲、高雅为独特定位,其清新的风格,平实的文风,亲近读者、贴近生活、关注民生的内容特点,很快为读者所接受并享誉评论界。当读者的认同变成了编者的遵循之后,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从内容到形式尽可能体现既定的风格。在满足绝大多数读者的信赖和期待之后,也有一些读者希望能看到一些变化。我们想,变是对的——向大多数读者希望的方向变。在尊重原有读者所认同的风格特点的同时,从内容到形式再作创新。首先是内容。“茶客”们的首要关注,自然是“茶”本身的色、香、味、醇,但上好的“茶具”也不可忽视,味醇爽口,赏心悦目,自然会令“茶客”平添情趣。因此,就内容的创新来说,研究读者需求,投“茶客”之所好,关心读者的关注点,调整栏目,尊重以往作者并重视新人,每辑增加若干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丰富其知识和信息含量,进一步追求有趣、有识、有用。在形式上,加大开本,改进装帧设计和版式设计,使其更具精神内涵和时代气息。

做这样的改进无疑要增加若干成本费用,直接的结果是定价的提高。这也是我们心存犹疑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对价格相对敏感的大学生、研究生读者来说。当然,我们也会尽量考虑热心读者的实际情况,尽可能不致增加他们的负担,改版后将辅之以相应措施。

毕竟“茶座”是作者、编者、读者共同的精神园地,越办越好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经济学家茶座

(第20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斌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副主编

刘德久

执行主编

詹小洪

责任编辑

董新兴

陈丹丹

金明善 /1

【国是我见】

刘国光 是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时候了/4

王玉霞 效率与公平动态均衡/9
巫继学 经济学拿什么来“拯救”我们穷人? /12

朱 玲 从“土地换养老”开始/17

【学界万象】

夏业良 经济学界资源配置的扭曲/24
李增刚 高等学校在引进与造就人才之间选择/32

党国英 不要妖魔化主流经济学/35

【学问聊斋】

陈争平 马克思思想的另一半/43
熊秉元 为经济学教育谋/49
张晓晶 经济学需要历史关怀/52
许 斌 经济学胜在出乎意料/57
刘福寿 经济学与诗/61

【经济评论】

顾海兵 北京黑车之白/68
王跃生 “文学的观光客”与“道德的十字架”/74
李文溥 艺术商品、市场与政府——经济学视角的一曲乱弹/79



吴要武 自然资源:神赐天粮还是
赵 泉 魔鬼的粪便? /83

【经济随笔】

陈 抗 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90
董国政 因战争而受益的十类人/95
陈彩虹 制度是人性弱点的产物/101
田学斌 乡土社会·人情经济/107
荆林波 名片趣谈/115

【生活中的经济学】

徐昌生 婚恋需要经济学——火车上
的一次偶遇与即兴解答/117
曲振涛 会议的经济学分析/122
聂辉华 挑战所罗门国王的智慧/128
郭艳茹 凿壁借光与沽名钓誉/132
王玉主 生活中的经济学——读《致命
的均衡》/135

【经济学人】

新 望 改革年代里的兄弟经济学家
——近看孙治方与薛暮桥/140

【经济史话】

梁小民 走西口与晋商(二)/144
李俊慧 唐宋兵制变迁的经济学
假说/150
王小嘉 话说鹰洋/1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20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7

ISBN 7-209-03810-8

I.经… II.金… III.经济学
-文集 IV.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第086893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82098901

E-mail:chazuo4901@sohu.com

发行部电话

(0531)82098027 82098028 8209802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1/32开

5印张 13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0.00元



是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时候了

●刘国光*

一、要历史、全面地看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思考,就是要历史、全面地看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2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10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但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的第二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直到如今,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

共产党向来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公平与效率相比时,把公平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呢?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关系;也与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有密切关系。这种形势迫使我们积极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国家实力,所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时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另一方面,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

因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

二、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

现在是重新考虑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时候了。邓小平在 1992 年时,就前瞻到 20 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收入差距已经发展到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所说改革失败的标志),也不能说到达承受极限。反映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客观上还处在上升阶段,如不采取措施,则有迅速向两极分化和向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可以第一步逐步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以后再逐步降低基尼系数的绝对值。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过渡。





我认为,突出和解决邓小平提出的问题,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因为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现在已经完成 GDP 第一个翻番和第二个翻番,正在进行第三个翻番阶段。在我国居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向全面实现小康水平过渡,并已经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实力,可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毋庸讳言,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结构已经逐渐形成占有财富、权力和知识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以贫困农民、城市农民工、城市失业者与下岗人员等为主的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有很强影响,在社会舆论和话语权中也很有影响。而弱势群体则缺乏相当的组织形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这种社会缺陷亟待弥补,如果令其发展下去,则只能扩大社会鸿沟,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我国改革之初,各阶层人民受改革之惠,生活改善,没有分化出明显的利益集团,普遍积极支持改革。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不同利益人群逐渐形成,有的在改革中受益较大,有的受益较小,有的甚至受损,对改革支持的积极性也有变化。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今后一定要强调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正、公平。

三、如何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和社会分配的问题

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社会分配问题丛生的因素十分复杂。体制上的弊端,法治上的漏洞,政策本身的不尽完善,等等,都是重要原因。这些方面近几年来政府做了很大努力,情况有所改善。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能解决的社会分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如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高于非垄断行业,相差几倍,久已为社会所议论,但至今尚未从源头上、从初次分配环节解决垄断利润产生和分配问题。

要利用税收杠杆。如个人所得税制度,本来是一种调节过高收入、抽肥补瘦的税制,但是多年来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却成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税法不严使一些富豪逃避交纳个税,个人所得税从抽肥补瘦变成了劫贫帮富的税制。现在抓紧完善个人的所得税制度改革,步伐





应当加快。又如遗产税，许多国家都把它当做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中国目前缺乏个人财产继承、赠与和转让法规，没有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和收入申报（后者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实行）制度等，这是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前提，应当加紧研究，积极准备。

国有资产划转给社会保障基金。这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福利的一项重要措施。现在地方国有资产大部分卖光，其收入有多少划拨到社保基金？国企改制中变现收入的用途，包括划拨给社保基金，要赶快立法。

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由经济建设型为主转变为公共服务型为主。这是与提高公民福利，促进社会公平有关的十分重要的改革。因为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多是低收入者，包括教育、保健等在内的社会福利措施，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改善人们进入多种就业和社会生活的平等机会。但是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转变滞后，因为这一转变往往受到许多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的限制。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公共服务，以至中国曾被世界卫生组织批评为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在各国文明国家中排名居后，尤其义务教育供应不足，相当多老百姓没有基本能力进入劳动市场，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当然这些情况都在改进，但与投入经济建设的资源相比，改进的速度还是很不理想。此外，一些地方还借经济建设与改革之名，使居民财产权利和收入权利受到侵犯，在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拖欠民工工资以及企业改制中损害群众利益浪潮的兴起中，可以看到政府权力过大，某些官员行为不正，吏治腐败的背影。

现在以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央加大了防治腐败的力度，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产生腐败现象的深层次矛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大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法制建设，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大家深切期望，也相信在中央巨大决心和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做到，在反腐斗争中不再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不再出现交通系统那样“前仆后继，死而后已”的现象。



四、强调社会公平，不是回到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

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加大公平的分量，但这样做，并不是要回到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老路上去。

中国改革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很少人想回到大锅饭的旧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深入人心，经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引发不满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体制内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规范收入。人们希望的无非是调整和纠正这些不公平现象，并改进运用再分配杠杆适当调剂贫富差距，而绝不是想触动那些合理合法的高收入。因此，强调社会公平谈不上会重新唤起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使改革开放以来达成的共识受到冲击。实际生活中，目前平均主义的残余，已限制在一些国有机构、产业部门中越来越少的部分，而且国有部门单位之间也出现相当大的收入鸿沟。残余的平均主义要继续清理，但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平均主义，而在分配天平的另一端，需要适当的校正。

应当指出的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现在有些被割裂了。好像这些年来，强调市场经济多了一些，强调社会主义少了一些。而在谈及社会主义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提高效率方面多一些，而强调它“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少了一些。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环境和人治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讲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邓小平告诫我们：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我们要避免这个前途，我们一定能够避免这个前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问题！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效率与公平动态均衡

●王玉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沿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路线不断变革。为了综合国力的提高,为了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社会必须寻找效率与公平最佳的组合点。

效率的一般定义是当投入一定的时候追求最大的产出,或者反过来,产出一定时,使用了最小的投入。效率概念的主要的含义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去最大程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我们知道,社会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生产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投入的生产要素被称做资源,如果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社会没有必要去追求效率。财富将拥有无限的源泉,我们没有必要节约,没有必要用最少的投入去争取最大的产出。

遗憾的是我们面对的是经济资源。所谓经济资源是相对于自由资源而言,它是有限的。用经济学术语讲它是稀缺的。稀缺的概念并不是指稀少和罕见,稀缺是指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求欲望而言不够用。人类需求欲望无限,资源有限,用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无限的欲望,资源配置时追求效率便是自然的选择。经济资源有多种用途,同样的资源既可以生产军用品也可以生产民用品,即可以生产消费品也可以生产投资品,资源的稀缺加上多种用途,就会使资源在配置时产生机会成本。有所得时必有所失,所失便是所得的机会成本。可见,资源配置时存在着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困惑。资源一定时,多生产军用品,就得少生产民用品,正如前苏联的国民抱怨说,他们篮子里的鸡蛋都被政府转化为原子弹了。同样,资源一定时,多生产消费品就得少生产投资品。生产消费品越多,意味着今天更美好;生产投资品多,提高了社会创造财富的生产能力,它意味着明天更美好。当资源充分利用时,不可能做到今天美好,明天也美好,今天多消费与明天多消费也是鱼与熊掌不能两全。

无论是生产什么产品,只要是没有浪费,用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

* 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出,都是实现了有效率的配置资源。至于军用品多还是民用品多,投资品多还是消费品多,取决于决策者的偏好,与效率无关,只要资源配置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均是有效率地使用了资源。不幸的是在资源配置时,存在着浪费现象,现有的资源没有合理使用。重复建设,偷懒卸责,甚至用稀缺的资源去从事不创造社会财富的非生产活动,这都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其结果是军用品不多,民用品也不多;今天不美好,明天也不美好。

效率目标的实现依赖资源配置的制度,典型的制度有两种,其一为计划,其二为市场。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配置依赖于中央计划。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均由庞大的行政计划部门决策,企业和个人没有决策权,只有服从权。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加上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企业和个人没有努力生产的激励。此外,由于信息搜寻成本过高,官僚主义及产权不明晰,中央计划无法做到有效率的配置资源。计划经济中,浪费及偷懒现象屡见不鲜。大量事实证明,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均陷入贫穷落后的陷阱。

完善的市场经济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源配置机制是被称做看不见手的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价格由商品的供求决定。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高价意味着利润较大,它引导着资源进入该领域。换言之,该领域为什么价格高,其原因是资源配置不足。相反,较低的价格反映出该行业无利可赚,甚至可能亏损。因此,过低的价格引导资源从该行业撤出。而该行业的价格为什么低,其原因是资源配置过多。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信息充分完备,资源由价格信号引导流入流出的结果是全社会资源在所有行业均赚取社会平均利润。既无暴利又无亏损时,全社会的资源得到了最佳配置。此外,市场经济有非常完善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利润的诱惑与破产的威胁就是企业与企业努力工作的胡萝卜与大棒。产权明晰、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及拥有较充分的选择权,均是能够调动个人潜能,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有利因素。

创造财富时我们追求效率的目标,犹如做蛋糕时,我们的目标是将做蛋糕的生产要素配置合理,使蛋糕最大程度地做大。而在收入分配时,我们要追求公平的目标。至少要做到其分配的结果,被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认同。不至于因为分配不公,产生争斗。因为争斗过程会将一部分社会财富白白地耗掉。





实行公平分配的困难在于公平的概念属于伦理学的范畴而非科学的范畴,它受价值观的左右。何为公平有不同解释,比如有人认为分配结果平均是公平,但干好干差一个样,干不干一个样,显然不公平。有人认为机会均等是公平,但由于个人禀赋不同,有的人生来聪明,有的人比较迟钝,有人有力气大,有的人力气小。机会相同,而把握机会的能力不同也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有人认为,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是公平;有人认为最大程度地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是公平,显然后两种公平的概念并非完善。公平概念的多元及公平内涵的宽泛,使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缺乏统一的标准,只好依赖于绝大多数社会公众的认同。有一个收入分配的公平底线能够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那就是收入与贡献对称,社会弱势群体拥有起码的生存保障。收入与贡献对称,可以通过生产要素市场来决定,按生产要素分配,可以实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称。谁提供的生产要素多,谁拥有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大,谁就获得较多的货币收入。这种分配方式提高了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有助于财富蛋糕的做大。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应由政府通过税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实现。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生存保障,不仅有人权道德伦理方面的意义,而且符合经济学原理。创造财富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关爱社会群体不仅对穷人有利,对富人也有利。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富人面临的社会风险大于穷人。

公平和效率存在互补关系,在以往的经济学研究中,学者大多注意它们矛盾的一面,如认为蛋糕分得太均匀蛋糕会变小,没有注意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公平收入分配,可以降低掠夺与反掠夺的成本,有助于财富的创造。我认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着动态均衡,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依赖于社会环境。若处于社会矛盾较小的环境,我们当然强调创造财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若处于社会矛盾大,收入分配明显不合理,弱势群体难以生存的环境下,公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超过了效率,因为在此环境下,蛋糕做得再大,也会被随后而来的社会动荡破坏殆尽。现阶段,我国社会处于上述两种环境之间,因此我认为在现阶段效率与公平同等重要,政府与市场应各司其职,逐步完善市场的功能,用看不见的手去解决效率问题。逐步规范政府的行为,用看得见的手去着重解决公平问题。政府与市场的界线不清及过多的越位,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





经济学拿什么来『拯救』我们穷人？

● 巫继学 *

经济学拿什么来“拯救”我们穷人？我们拿什么来完成温家宝总理最近给经济学界关于多研究“穷人的经济学”的嘱托？自温总理提出这一任务后，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然而，迄今并未见到有人深入思考，认真回答经济学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帮助穷人，用什么样的方法引导穷人走出困境，奔向小康，步入富裕的金光大道。

我们能指望在中国大地大红大紫的主流经济学吗？全盘私有化，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国有企业破产与大型国有企业 MBO，土地私有化，如此等等，精英们的这些主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举措已经给中国经济，给中国的贫富差距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几乎是每一个公民特别是每一个劳苦大众都切身感受到了的。如果有人说，正是这些令人质疑的理论与举措在制造穷人，我以为绝非无缘无故。虽然直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富人的经济学尚缺乏科学论证，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也绝不是为穷人服务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主流经济学，从来都是注重经济现象分析，回避经济关系的研究，从来都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来看待改革与发展问题，从来都是回避乃至掩盖经济社会的生产关

系本质，特别是对劳资关系讳莫如深。如此庸俗化的经济学，我们穷人、我们劳苦大众能期盼它什么！

难道就没有为穷人、为劳动者服务的经济学，有！那就是作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巨著《资本论》。谁都知道，《资本论》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我们穷人的经济学，是我们的“圣经”。恩格斯曾经说过，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过去，我们更多地从政治、从革命角度理解《资本论》，其

*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实如果我们与时俱进地从经济、从建设的角度来解读《资本论》，同样具有划时代的科学意义。

第一，《资本论》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科学地论证了劳动创造价值，整个社会财富都是劳动者的成果，劳动是经济社会的“太阳”。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如此神圣，世间所有财富都是经过劳动之手点石成金，都是劳动的果实，以至于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整个世界都弥漫着劳动的恩惠！从而在本质上回答了劳动在经济社会的位置，廓清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这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待劳动者，如何保障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提供了科学的根本立场。

第二，书中关于劳资关系的论述，对于处理当今社会的劳资关系，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从我国经济社会的现状看，劳资关系的和谐是社会最本质也是最大的和谐，劳资和谐是当今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向世人展示了劳资关系恶性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其的严正关注！通过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嬗变为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据统计，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总数已逾 1.5 亿，这 1.5 亿农民工所在的企业，基本上是私有经济中的非公有制企业，那么农民工面对的基本上都是私企老板，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意义的劳资关系。非公有的私有经济在我国，目前已经占据半壁河山。庞大的私有资本，庞大的农民工的劳动，由此结成的劳资关系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影响力，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由于劳资关系在当今中国愈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关系，因而劳资关系和谐程度，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良性程度，从而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程度。

第三，书中揭示了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有一种永无休止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趋势，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认识到这一点，作为经济管理部门应该以经济手段来减少其负面影响，弘扬其正面效应。永无休止地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正面意义在于，正是这种“经常的冲动”与张力，成为市场经济奔腾向前的引擎，成为企业不断发展、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强劲动力。不仅如此，追求利





润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运营成本的减少，产品成本价格的降低。可以说，资本的这种精神，使得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然而，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资本追求企业利润，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往往会忽视社会效益；其次，由于在劳资关系中资本是强势方、劳动是弱势方，这样会经常置劳动于不利的境地；最后，追求最大化的本性，会千方百计地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减少劳动环境的投入，尽量减少改善劳动者居住条件的支出；它的综合效应就是使社会和谐出现问题。

第四，书中揭示了在工业化革命的进程中，城市化进程也同步进行，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镇，类似我们今天称之为的“农民工”的悲惨处境，令人触目惊心。作为政府，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通过经济政策维护农民工的权益，降低资本的“原罪”风险，是最为神圣的职责。如果关注一下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发生在英国早期的那些丑恶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在我国私人企业中活生生地发生着。所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正当全球掀起反马克思《资本论》浪潮时，它的著名理论被又一次证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正在上演一场《资本论》的当代“迪士科”版本，一场活生生的现实剧。

第五，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拥有个人所有权的理论，论证了劳动者对劳动力的所有权与资本家对财产的所有权具有同等的权利。这便为劳动者最终争取自身的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权威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发展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果说天赋人权，劳动力所有权才是最核心的天赋权利，它是劳动权的核心。承认劳动力所有权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它直接为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于智力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作用提升，劳动力所有权获得与资本所有权共享新经济成果的权利。但是，作为一般的打工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力所有权并没有获得尊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这种天赋权利被资本极大地漠视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对打工者的种种歧视行为，压低报酬与克扣工薪，恶劣的工作环境等，都是对劳动力所有权的蔑视。

第六，马克思在对重农主义的扬弃中，对农业产业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观点，至今，这些被长期尘封的理论观点依然熠熠闪光。它对于理

